

中國教育史研究

教育叢書

楊亮功等著



復文圖書出版社

大 學 用 書

中國教育史研究

楊亮功 等 著

政大教育叢書之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教育史研究

著者：楊亮功等

出版者：漢苑出版社

發行者：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址：高雄市同慶路一〇六號

總經理：高雄復文書局

地址：高雄市同慶路一〇六號

電話：(〇七) 二〇二四四三三
二九二四三三七

郵撥：〇〇四五六五八一號

彰化復文書局

地址：彰化市進德路七號

電話：(〇四七) 二四四一〇三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八〇四號

特價：精裝：一四〇元整
平裝：一二〇元整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月再版

¥18.75

序

本校自民國四十三年在台復校以來，瞬已二十有三年。歷年出版之「學報」，已三十餘巨冊。其中所刊之論文，均學術之重要著作；然以諸類文字彙集，且冊籍沉重，參考殊不方便。今夏適逢本校建校五十年，一則爲慶祝五十週年校慶，一則爲便利研究參攷，遂將以往學報論文分類重刊，此分類叢書編輯之所由始。

近世科學發達，學術研究，崇尚分科。而學術之變遷升降，嘗與時代精神相表裏。茲學報分類叢書，釐訂既竣，問世在邇。具見我政府顛播之際，百廢俱興，民生樂利，社會繁榮，法治燦爛，與夫學術之猛進。以較彼岸之天地爲籠，人心鼎沸，不可終日，奚啻霄壤之隔，信乎剝復之契機，重康之左券也。

夫學術爲學問之根底，思想乃學術之源淵，政治之發展猶學術之滋補品。綜此三者，皆力加闡發。是故本分類叢書之編輯，於學術之重者，雖微必錄。於思想之善者，雖寢必刊。於時代之關者，雖簡必選。使閱者得知盛衰之所由，蓋無不謀學術思想之宏揚，欲國家邁入現代化之境界。

今卷帙粗成，用綴片言以爲介。此後將繼續增刊，隨時出版，備百年以損益。際運會之方興，不愆不忘；俾省覽之有文，可太可久。願共勉之。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

歐陽勛 於政大

編輯大意

一、本大學業已建校五十載，學報叢書編審委員會，爲慶祝五十週年校慶，編輯學報論文分類叢書，除示慶祝外，旨在便利研究之參稽。

二、本分類叢書，係就本校已出版之學報，自第一期（民國49年）起至第三十二期（民國65年）止已刊出之論文，斟酌其性質，按其學術所屬之領域，一併分類編輯而成。其如有無所歸類者，則另輯一冊，以備一格。

三、本分類叢書所收之論文，或棄或取，隨宜乘便，一求其當，皆由各系、院、所精心選擇之。均爲思深旨遠，有功世道之作。無美不備，資爲參攷，當有助於學術研究之發展。

四、本分類叢書，共分爲二十二種。每類論文彙輯二十五萬言上下時編爲一冊。就學報上已刊出者，原則上依其先後之次第，編爲第一輯、第二輯……且就各輯之內容而另命書名。將來者則可續列爲第三、第四輯，乃至第五、六輯。

五、本分類叢書，就論文之性質，約分爲二十二種。其名稱如左：

- 1 國父思想論集
- 2 中國文學論集
- 3 東方語文學論集
- 4 西洋語文學論集
- 5 教育學論集
- 6 大眾傳播學論集

- | | |
|---------------|---------------|
| 7. 史學論集 | 15. 財政學論集 |
| 8. 哲學論集 | 16. 行政學論集 |
| 9. 數理學論集 | 17. 土地經濟學論集 |
| 10. 心理學論集 | 18. 經濟學論集 |
| 11. 法學論集 | 19. 國際貿易學論集 |
| 12. 政治學論集 | 20. 會計學及統計學論集 |
| 13. 國際關係論集 | 21. 貨幣銀行學論集 |
| 14. 民族學及社會學論集 | 22. 企業管理學論集 |

六、本分類叢書之彙編，學報叢書編審委員會深得本校各系、院、所之鼎助。通力合作，始克有成。因書數言於簡端，以記之。

七、本校學報叢書編審委員會，人力有限，識力有限。對於本分類叢書之編輯，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中國教育史研究

目 錄

一、國父教育思想與中庸之道·····	楊亮功·····	一
二、中國教育思想的演進及其要義·····	劉 眞·····	一五
三、中國倫理之演變及其精神·····	吳 鼎·····	四二
四、西周教育管窺·····	陳粵人·····	七四
五、漢代教育制度研究·····	楊承彬·····	一〇五
六、魏晉教育制度研究·····	楊承彬·····	一三四
七、兩宋學校制度之分析·····	程 運·····	一五八
八、兩宋學術風氣之分析·····	程 運·····	一九一
九、張載教育思想之研究·····	吳昱昶·····	二一二

國父教育思想及中庸之道

楊亮功

中庸之道，是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思想。遠在三千年前，我國古代帝王堯、舜、禹、湯、文、武皆以中庸之道爲修身治國之準繩。論語載：「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註一）這就是說堯傳位于舜，舜傳位于禹，皆以「允執厥中」之道，遞相傳授。至于湯，亦是實行中庸之道，故孟子稱「湯執中」。到了周之文武。孔子亦曾說道：「張而弗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也。」（註二）張而弗弛，乃是太過，弛而弗張，乃是不及。文武之道，乃是一張一弛，合于中庸之道。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以孔子的思想亦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中庸之道。中庸思想至孔子已發揚至頂點，後代所講的中庸教育，莫非繼承孔子思想。孔子作易象傳言「中」者三十五卦。象傳言「中」者三十六卦。在論語、中庸書裡，其所稱道中庸者，尤不一而足。

「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註三）。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註四）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註五）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註六）

「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註七）

「回之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註八）

以上所引各節，即是說明孔子重視中庸之道。孔子認爲中庸之道，誠屬至善盡美，而難于實行。知者、愚者、賢者、不肖者或過失之太過，或失之不及，皆不得其中，即以孔門弟子而論，只有顏回能「擇乎中庸」。此外如子張子夏諸人則不免或過或不及。「過猶不及」，皆不得其中，其失則一。至于聖人乃「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雖不爲世所知而不悔，故能「從容中道」。

國父的思想亦是繼承中國儒家傳統的中庸之道。蔡子民先生在他的「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一文中，曾說道：

「三民主義雖多新義，爲往昔儒者所未見到，但也是以中庸之道爲標準」。（註九）
又說：

「中庸之道，常爲多數人所贊同，而且較爲持久。這可用兩種最有權威的學說來證明他：一是二千餘年傳統的儒家；一是近年所實行的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註十）

蔣總統在其「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講詞中亦曾說道：

「總理做事情向來極端的，不妥協的，然而他的哲學上，却不偏不倚，完全講的是中庸之道」。（註十一）

國父自己亦曾說道：

「我既自稱革命家，社會疑義紛起，多所誤會。其實中國式之革命家，究不過抱溫和主義，其所主張非極端主義，乃一良好的穩健之政府」。（註十二）

基于上述，國父的革命思想乃是承繼中國儒家傳統的中庸思想。因此國父的教育思想乃是以中庸之道為基礎。

國父平生雖無教育專門著作，然其涉及教育問題之言論，散見于文字演說中者，不一而足。若詳加分析，不難發現其言論皆以中庸思想為依歸。例如在教育上所發生的經常爭辯而對立的問題——知識與實用，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以及集權與分權等問題，持論者往往各有所偏，而趨于極端。

國父對於這些問題莫不持之以中庸之道，綜合學疑，折衷兩端，而求其至當。茲就各項問題分別說明如下：

一、知識與實用問題

關於知識與實用問題，即是波特 Boyed H. Bode 在其所著「現代教育學說」Modern Educational Theories 一書中，所稱的亞里士多德式文化主義與偏狹的職業主義問題。這兩種極端主義，各自有其缺點。亞里士多德的文化理想專重視理知的培養，迷信訓練，蔑視實用。反之，偏狹的職業主義則限制知識于實用範圍，皆是各有所偏，而非中庸之道。杜威曾說道：

「所謂普通訓練便是訓練到沒有用處的程度，這種假定是很難給他一種適當哲學基礎的。訓練修養最後必須要用應用利益來衡量」。（註十三）

但是波特却說道：

「專顧着金錢價值的學問，不會有什麼精深與廣博。學者對於學科本身沒有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決不會得到科學的真意義或研究上的想像與獨創性。要真有實用，必超越實用範圍以外，才有充

裕的知識，以應付情勢的變遷。一種學科，愈不急於實用，愈有實用，這是逃不了的一個逆說」。
。（註十四）

上面兩段話，乃是說明極端的主知主義與極端的實用主義皆各有其缺陷，求知知識的最後目的總當爲實用。如果所求知識只限于目前需要，爲實用所囿，則其結果不但阻止知識的發展，且亦限制知識對於實用的貢獻。欲求人類知識之進步，必須超過實用而達到爲求知而求知之階段。並且有些地方，「愈不急於實用，愈有實用」。譬如原子科學家路德福(Rutherford)是最先知道原子的變化。他並能以實驗導致原子的變化，但是他自己曾說過原子能是一種純粹科學，不會有實用價值。然而他死後不出十年，原子分裂的發現，導致了人類進入了原子時代。所以知識與實用是不能分開的。極端的文化主義與偏狹的職業主義皆各有所偏。

國父孫先生是主張知識與實用同時並重。他的教育思想是基于中庸之道，而不偏于一端。他說：

「學校之目的，于讀書識字學問知識之外，當注重于雙手萬能力求實用」。（註十五）

國父這幾句話就是說明求學問與求實用當同時並重。國父認爲要求實用必有待于學問知識。他

「今見學生諸君，令人健羨，益見非學問無以建設也」。（註十六）

又說：

「要你們的人工都有用處，都能夠製造礦產貨物，必要有知識，要有知識，就要有教育」。（註十七）

又說：

「諸君到這個學校來求學。……自然立志做『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什麼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註十八）

又說：

「所以我們要進學校讀書，取古人中外人的知識才學來幫助我做一件大事，然後那件大事便容易成功」。（註十九）

由上所述，可見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無論是從事建設，或製造貨物，或做『革命軍』，皆要有知識。因為知識是一種方法，有了方法，方能達到實用的目的。所以國父又說：

「無論做什麼事，成功都是在有好方法。方法是自何而得呢？是自學問知識而得。先有了學問，便有知識，有了知識，便有方法」。（註二十）

但是國父絕不認為知識學問只限于實用。國父是重視文明進步的。他說：

「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泉源也」。（註二十一）

又說：

「蓋學問為立國根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購來」。（註二二）

又說：

「求學的意思便是求知識。因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們不知道的。又因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識，才能夠進步。有了知識，那個進步才很快，我們人類是求文明進步的，所以人類便是求知識」。（註二三）

國父認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識，才能夠進步，有了知識，那個進步才很快」。又云：「我們人

類是求進步的」。總之，國父對於學校教育一方注重實用，另一方面却重視文化進步。因此對於知識本身之發展，亦絕不輕視。這是折衷亞里士多德文化主義和偏狹的職業主義，而使之歸于中庸之道。

二、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

關於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教育上亦是經常相對立所爭辯之問題，而持論者亦往往趨于極端。教育上個人主義最早為希臘普羅特哥拉 Protagoras 和哥爾基亞 Gorgias 等詭辯派所倡導。乃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此派視教育為個人發展之事。反對抹殺個性的教育。認為教育決非可以作為國家社會之手段。文藝復興後，一般人文主義教育家亦多注重個人品德之養成。到了十八世紀，個人主義教育經盧騷之闡揚，在理論上大臻鞏固。盧騷主張「人因為他自己而受教育，不是為別人」。〔註二四〕盧騷以後，一般自然主義教育家如裴斯特羅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海爾巴脫 J.F. Herbart 1776-1841 福祿貝爾 F.W.A. Froebel 1782-1852 諸人其教育思想亦多偏重個人品德與才能發展。此後瑞典女教育家 Ellen Key 承繼盧騷思想。她認為「教育是開發固有的個性之事業」。最近英國教育家南恩 Percy Nunn 主張個人主義教育最力。他認為必須使人人「得有各種條件，在此種條件下，個性得有最完善之發展」。〔註二五〕

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當溯源于紀元前九世紀斯巴達立法者賴寇古斯 Lycurgus。他認為「人為國家而生，非為自己」。繼之為柏拉圖，他為矯正當時個人主義之弱點，遂不惜走入另一極端。他主張教育目的：「當以誘掖督責，使學國之人，皆為有益于國家之人，然後就彼等性之所近，而勉事其事，如是則國家受其益」。〔註二六〕其後經過文藝復興一段長時期，教育多偏重于個人主義。至十九世紀國家主

義教育復行抬頭。德國裴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法國傅葉 Alfred Feuillee 皆是提倡國家主義教育。國家主義教育的理想至黑格爾 Hage1 發展已至頂點。南恩謂：「普魯士人狂信國家之絕對價值，道德威權不能大于國家威權。……此種理論，實導源于黑格爾之理想主義」。（註二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凱欣斯泰奈 Georg Kerschensteiner 亦是偏重國家主義教育，他重視國家公民教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德國國社黨，則是一種極端的國家主義教育。他們把一切威權都付託給國家，必使每個人的身體和靈魂俱屬國家。

社會主義的教育是對於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盛行的個人主義教育一種反動。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孔德 A. Comte 創立社會學，將個人與社會關係作一新解釋。他說：「真正的個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人類才能存在。因為不管從那一方面看，我們個人的一切發展都虧着社會」。（註二八）此後一般社會學派的教育家如諾爾普 P. Natorp 爾格門 P. Bergemann 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皆認為教育目的當由社會學來決定。杜威的教育思想最初亦是偏重于社會主義教育，他說：「教育是社會進化及改革的基本方法」。

由上所述，由于個人與國家社會關係解釋之不同，其影響到教育方面，遂有個人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育。而演進的結果，往往各趨于極端，而各有其缺陷。譬如主張個人主義教育者認為教育為的是發展個性。須知個性的發展，實有賴于國家和社會的諸種制度或成訓之薰陶，以繼續改進其經驗。離開國家社會，則個性之發展將不可能。反之，如主張國家社會主義教育者僅視教育為國家社會的利益而設。視教育為國家社會的一種純粹工具，無限制的拘束個性之發展。則其結果，國家社會所欲取得教育上之利益，將無從而獲得。而國家社會之進步，亦將遭受阻碍。因為國家社會欲取得最優服務于

各個人，必須聽任各個人得以自由發揮其優點。

國父對於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的看法乃是不偏不倚，而歸于中庸之道。國父首先指出中國與外國社會組織之不同。他說：

「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外國是以個人以為單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中間，再沒有很普遍的中間社會。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然後才是國族」。（註二九）

由于中國社會組織以家族為重心，在個人與國家社會間，有了中間一層組織，因此減輕了個人與國家社會對立形勢。所以在中國既不能有絕對的個人主義，亦不可能有絕對的國家社會主義。再說到個人和家庭對於國家社會的關係，國父說道：

「社會係對待個人而言，社會主義係對待個人主義而言。英國尊重個人，主張極端自由。德國以國家為本位，個人為國家一分子，又寧犧牲而不惜也。此則以其國家政體之不同，故其主義亦因之而異。主張個人主義者，莫不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社會主義者又莫不反對個人主義。聚訟紛紛，莫衷一是。然而個人社會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發明，而未可以是非之也」。（註三十）

又云：

「中國便是大家的國家。你們都有一個家，家和國有什麼關係呢？家庭要靠什麼才可以生活呢？各個家庭都要靠國才可以生活，國是集合幾千萬家庭而成，就是大眾的大家庭」。（註三一）

國父謂：「個人社會本大我小我之不同，其理可互相發明」。又謂：「各個家庭都要靠國才可以生活，國是集合幾千萬家庭而成」。這皆是說明個人家族對於國家社會的關係，皆是相需相成，而非相對立的。

國父認為個人在國家社會上有絕對存在的價值，國家必須給予各個人平等機會的教育，以求其發展。
國父說：

「因為民國的人民人人都是主人翁。……所以建設一個新地方，首先在辦教育，要辦普及的教育，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後人人知道替國家去做事」。（註三二）

這一段話，即是英國人所常說的「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主人」的意思。反過來說，個人為求得其發展，亦必須有賴於國家社會之薰陶。所以國父又說：個人「以受社會種種之教養，始有發明……之機會。國父的教育思想，一方面不可忽視個人的發展。另一方面則重視國家社會的利益。國父說：「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然後人人知道替國家去做事」。又說：「諸君現在求學的時候，……有了學問之後，便要立志為國家服務，為社會服務」。（註三三）又說：「學生立志……萬不可要想達到甚麼地位，必須要想做成一件什麼事。……達到什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於群眾的」。（註三四）又說：「才智者既研究各種學問，……則當用其學問，為平民謀幸福，為國家圖富強」。（註三五）這皆是說明教育必須重視國家社會的利益。

國父不僅認為教育當以國家社會利益為重，同時國父認為教育必須使個人對家族和國家社會同時都能盡其責任。因為在中國社會組織裡，個人不僅為國家社會一份子，同時亦是家族的一份子。因此個人對於家族和對於國家社會都應盡其責任。國父說：

「學生受先生的教育，……對於家庭有孝順父母愛家庭的責任，對於國家也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是更大的，是四萬萬人應該有的責任」。（註三六）

國父將親愛家庭與爲國家盡責爲社會服務同視爲個人受教育的重要目的，這是基於中國的社會組織，也是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

總之，國父教育思想是基於中國社會組織，爲個人主義教育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折衷。國父尊重個人權利，重視個人的發展，同時亦重視國家社會的利益。認爲教育目的乃在於使個人對社會服務對國家盡責任。而個人又爲家族的一份子，個人對於家族亦應盡其責任，這正是國父的中庸教育思想。

三、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

由於各國政治制度之不同與各國教育制度發展之互異，因此各國在教育行政上有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兩種主張，甚至形成了兩個極端。凱德爾 J. Kandel 在其所著「比較教育」一書上對於集權的制度與分權的制度曾有一個簡明的解釋。他說：

「集權的制度，主張整齊劃一，按了舊典型來造就下代的國民。……分權的制度則重地方不同環境的適應，參差且多變化。……前者要把所有教育進程一一納之于中央統制之下，後者除滿足至最低限度的標準外，其餘留待地方自由創造自由發展」。（註三七）

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各有其利弊。集權的優點，在於整飭全國教育的行政效率較大，並且在整個計劃下，全國教育得以均衡發展。其缺點，則因過于整齊劃一之故，不能充分適應各地不同的需要。反之，分權的優點，在於能適應各地之特殊需要，並得以促進各地之自由發展。其缺點，則因各地區經濟文